

责任编辑：李智善
封面设计：刘 静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著名企业家论改革/何伟, 魏杰主编.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8. 7
(中国经济改革文库; 第3卷)
ISBN 7-80100-448-5

I. 中… II. ①何…②魏… III. 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F27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0193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 100027 电话: 64153909

北京顺义振华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45 100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80100-448-5/F·157

定 价: 156.00 元

本书编委会

顾问：吕 东 袁宝华

主 编：何 伟 魏 杰

副主编：张翼翔 周淑芬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绍民（赣）	王顺生（沪）	王政祥（豫）
王 杰（甘）	刘 铮（吉）	吕 林（苏）
何 伟（京）	杨 枫（浙）	依丽娜（辽）
张 萍（湘）	张翼翔（赣）	周淑芬（京）
贺 阳（京）	赵海成（鲁）	崔焕青（冀）
裘祖贵（冀）	魏 杰（京）	

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们组织编著的《中国经济改革文库》的第三卷。第一卷为著名经济学家论改革，第二卷为党政人士论改革，这两本书均已出版。本卷是著名企业家论改革。

经济学家、党政人士，企业家处于改革的不同位置，所获得的信息及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对改革会从不同的方面给以论述，从而会使我们对改革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以避免改革走弯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克服许多困难，组织编著了这几本书。

企业家处于改革的第一线，是企业的“灵魂”。本卷作者均系站在改革前沿的企业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塑造者、参加者。将这么多富有改革实践经验的企业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以他们亲身体会和感受来广泛畅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建议，汇集一册，可谓集思广益，取众家之长，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谈的不只是企业改革，而是以企业改革实践为源泉，提炼升华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这是本卷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通卷体现了改革精神、改革实践、改革理论的有机统一。人们读后可以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进程、理论发展和取得的成果，包括了解企业家的想法和要求。

本卷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总体探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体制创新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股份经济的发展；搞活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经营管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乡镇企业的改革与发展；金融流通体制改革与市场体系的建设。

作为艰辛跋涉、敢于探索的见证和结晶，本书是认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企业改革的重要文献。通观全书，还能令人欣喜地感受到中国企业的改革者——“实践着的理论家”的茁壮成长，看到中国改革成功的希望。

这本书的作者，既有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的企业家，也有民营企业家的，他们的感受不同，因而对改革论述的重点也不同，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尽管他们出发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认为传统的体制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必须彻底打破，应该彻底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总结他们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企业今后有十大发展趋向：

一、企业融资方式由单纯的间接融资走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结合。我国国有企业过去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银行。但现在这两个资金来源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了。首先，现在的财政已经成为赤字财政，债务财政，“吃饭”财政，因而给企业所提供的资本金是极为有限的；其次，银行现在一方面不良债务大量增加，据粗略统计有

2 万亿左右，另一方面是自有资金占有率急剧下降，仅有 3.3%，远远低于国际惯例的要求，因而银行的金融风险在加大，为企业所能提供的资金也是有限的。既然仅靠财政与银行已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那么就必须通过股份制以及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从而使企业实行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结合的融资方式。

二、企业组织形式从中小企业中走出一些大企业集团。我国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现在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99%。中小企业普遍都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无有专利技术，基本上没有技术开发能力，从而使企业既无法通过技术创造新的需求，又无法降低成本；二是市场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使得企业对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很低下，而且市场秩序也难以稳定，非正常竞争及过度竞争难以消除；三是规模不经济，成本过高，企业竞争力极为低下。因此，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正从中小企业中，走出一些大企业集团，它们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

三、企业的经营方式由单纯的生产经营走向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生产经营是经营产品，资本经营是经营股权，包括部分股权及全部股权，即企业本身。从企业的风险防范及追求回报率等方面来看，企业应该实行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离开生产经营搞资本经营往往会形成泡沫经济，但离开资本经营单纯搞生产经营，既难以使企业有效防止风险与有长远发展能力，又难以使资产有较高的回报率，尤其是使资产难以具有较高的运转灵活性。因此，我国的企业应从现在的单纯生产经营，走向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

四、企业在产权结构上由一元化产权结构走向多元化产权结构。实践表明，企业充满活力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产权结构多元化，因为一元化的产权结构是难以适应现代经济要求。例如，就一元化产权结构的国有企业来说，是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困扰的，政企分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又例如，就一元化产权结构的私有企业来讲，是难以摆脱家族血缘关系的困扰的，企业的正常要求往往被家族血缘关系所扭曲。尤其是应当看到，无论任何性质的资产，只要其所有者的经营能力及水平达不到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时，其资产都不会保值增值，企业都不可能充满活力，这就要求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资产能由那些经营能力强及水平高的企业家来经营，从而也就要求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是企业充满活力的产权制度的基础。因此，我国的企业要由一元化产权结构走向多元化产权结构。

五、企业的产业选择由盲目性走向自觉性。我国企业过去对产业的选择极为随意，基本上不考虑市场发展趋向。而现在则不行了，因为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已由企业主导市场走向了市场选择企业。在我国过去的短缺市场条件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基本上是企业主导市场，但随着我国市场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市场已开始选择企业，那些不符合市场对产品的成本与结构要求的企业要被淘汰，因而会出现企业大分化与大改组的趋向。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产业选择必然由盲目性走向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需求满足上的自觉性，即最大效用地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二是竞争力上的自觉性，即追求低成本与高质量。企业在产业选择上的自觉性，必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结构不合理的企业基础，是企业产业选择的盲目性。因而调整结构不合理，最终有赖于企业产业选择的自觉性。

六、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行政配置走向对企业家的选择。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担当的，只有企业家才能成为企业的优秀经营者。企业家是指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力，对经济生活具有极为灵敏的反应力，并且将企业发展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综合性人才。正因为如此，所以企业家是稀缺人才。只有企业家掌握了企业的经营命运，

企业才能具有充分的活力。但是我们过去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选择经营者，而是用行政性标准及行政方式为企业配置领导人，结果是让那些根本不是企业家的人去经营企业。虽然这些人中不乏有不少品质优良的同志，但他们却不是企业家，因而也就不可能经营好企业。被人称道的好人并不一定都能经营好企业，选择经营者不是选择雷锋式的好人。因此，必须从对企业经营者的行政配置，转向对企业家的选择。这包括选择的机构与标准，以及对企业家应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尊重等问题。

七、企业在要素的选择上从依赖低层次的要素市场走向依赖资本市场。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要素是政府行政配置。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企业逐步放开了生产资料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但这仅仅只是低层次的要素市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选择生产要素的关键，是要有高层次的要素市场，即资本市场。因为无论是企业选择劳动，还是选择生产资料，其前提条件是首先要有资本。只有有了资本，才有资本的具体形态，如劳动力及生产资料等。因此，我们必须构建完善的资本市场。一是要发展间接融资中有关资本市场的内容，如增加一年以上的长期贷款等。二是要发展直接融资，包括有价证券、基金、投资银行等。三是要发展产权市场。产权市场在西方是没有的，因为西方产权都证券化了，交换有价证券就行了。但由于我国的产权并未被有价证券化，因而产权流动不能不依赖于产权市场。

八、企业资产从固态化走向动态化。企业若要有活力，就不仅要产权清晰，而且产权要能流动，即资产必须是动态化的。我国企业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是企业资产固态化，国有企业的资产不仅因被行政性条块分割而不能跨地区、跨部门流动，而且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不能跨所有制成份流动。尤其是在目前的股市不完善的条件下，企业资产在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实际上也不能流动。因此，必须促进企业资产的动态化。一是要为资产动态化创造条件，例如产权应该有价证券化；二是要消除动态化的各种障碍，如利益障碍、机制障碍等。

九、企业分配方式要从单纯的按劳分配走向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过去我们把按劳分配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把按要素分配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看来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实践。企业充满活力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共同贡献，因而必须肯定各种要素的贡献，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技术与管理等生产要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必须肯定这些生产要素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能有一套要素贡献的评价机制与指标，形成新的分配制度。

十、企业国际化要从单纯国际贸易走向国际贸易与资本国际化相结合。我国企业目前融入国际社会的主要方式是国际贸易，但现在由于贸易对方的逆差反倾销政策等原因，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单纯的国际贸易无法使我国企业融入国际社会。唯一的办法是在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使我国的企业资本融入国际社会。一是要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并且这些跨国公司的资本应是多国化的；二是我国的企业资本要进入世界跨国公司，并对有条件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入；三是发展外资在我国同我国企业资本的融合。只有资本国际化，我国的企业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

主编

1998年3月

3

目 录

序.....	主编 (1)
--------	----------

○第一编 中国经济改革总论

加速政府职能转变, 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何 伟 (京) (3)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个问题——兼论上海经济改革	贺镐圣 (沪) (8)
我国经济改革之路探析	张传法 (鲁) (38)
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张景焘 (冀) (46)
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	张兴让 (冀) (54)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熊克来 (赣) (65)

○第二编 所有制改革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关于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理论思考	兰世贤 (吉) (81)
社团所有制: 产权制度改革模式的选择——横店集团	
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徐文荣 (浙) (95)
跨地区的产权结构调整是上海国有企业的发展新路	马立行 (沪) (110)
公有制个人股权的诞生——身份股权	王玉铁 (黑) (118)
关于大型国有企业实现形式的探索与实践	孙梦兰 (京) (122)
关于劳动群众联合经济组织的性质、组建和管理	程 敏 (沪) (127)
从“大快活”之路探索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途径	
——兼论培育新疆经济腾飞的生长点	邓小财 (新) (132)

○第三编 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对接	王铁男 (吉) (14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走向市场竞争——对一个国有	
中型企业改革的几点思考	黄问初 (赣) (155)

从上海住总集团的改革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上海住总集团总公司 (沪) (169)
- 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与探索 杜自弘 (浙) (175)
- 铸造新机制 再创新业绩——太平洋机电集团构筑起
-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 冯忠祺 (沪) (179)
- 制约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内因剖析 余瑞德 (湘) (187)
-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之我见 陈士球 (赣) (197)
- 深化企业改革 促进企业发展 王贵仁 (沪) (209)
- 深化企业改革 转换经营机制 李南山 (沪) (214)
- 纵论企业改革——从洛玻的腾飞谈起 郭晓寰 (豫) (220)
- 在改革中不断前进的上海航标厂 王伟时 (沪) (239)
- 只要不断深化改革 小铅笔也能创奇迹 胡书刚 (沪) (243)
- 振兴民族工业, 在改革中再铸亚广和辉煌 吕永杰 (沪) (248)

○第四编 股份经济与上市公司的发展

- 中国股份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 韩志国 (京) (257)
- 股份制经济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 唐忠民 (吉) (276)
- 中国股份制发展的道路探析 章九根 (赣) (293)
- 以资本运营为突破 推动上市公司发展 刘士福 (辽) (313)
- 关于上市公司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万殿卿 (吉) (321)
- 模拟市场目标利润责任制是股份制企业建立
- 新机制的有效方式 吴亦新 (沪) (325)
- 坚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发展道路 赵坤兴 (沪) (331)

○第五编 搞活国有企业与发展企业集团

- 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思考和探索 黄关从 (沪) (337)
- 树立风险意识 直面市场竞争 郑洪臣 (辽) (345)
- 浅议搞活企业的有效途径 张景荣 (吉) (350)
- 资产占用责任制是促进国有企业效益增长的有效途径
- 吕毅华 (冀) (358)
- 苦炼内功是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动力 郑维峰 (鲁) (365)
- 深化改革 重振名牌品位 进一步搞活国有大中型
- 企业 葛文耀 (沪) (371)
- 国营企业如何面向二十一世纪 徐孝纯 (京) (378)
- 实现两个转变 激活国企生机 云南红塔集团 (382)
- 实施兼并战略 增强企业实力 吴殿久 (豫) (386)

推进资产重组 发展企业集团	张庆忠 (京) (393)
我国企业集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及发展对策分析	尤海明 (吉) (402)

○第六编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管理

适应市场 驾驭市场 建立现代企业经营决策机制	
——郑州百文集团公司的实践与探索	李福乾 (豫) (413)
眼睛向内,苦练内功,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 ...	周砚田 (豫) (420)
以资产经营为手段 追求市场最大化、经营多角化 ...	黄永昌 (沪) (430)
略论企业战略	张成山 (豫) (434)
转变观念 深化改革 实施“高起点、创一流”战略	
.....	杨炳芳 (浙) (440)
国有企业跨世纪全新管理模式的探索	竺福江 (浙) (447)
脱胎换骨 重铸辉煌——浅谈现代管理在国有企业改	
组中的应用	全国良 (沪) (458)
抓好管理 适应市场	黎明 (沪) (462)
模拟市场核算 深化成本管理	刘汉章 (冀) (474)
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关键在人才	朱瑾 (沪) (483)
论国有大型企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贾永华 (湘) (489)
论企业家和企业改革	万里扬 (赣) (503)
建立一支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刻不容缓	赵希友 (辽) (515)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系统分析	李蒙 (吉) (520)
优化外部环境 为企业建立技术进步机制创造条件	
.....	李昆木 (甘) (544)
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联想集团的成功之路	
.....	柳传志 (京) (552)
探索创办独具特色的外向型企业	盛孝基 (鲁) (558)
铁树开花 绽新艳——恒源祥在改革中勇创名牌纪实	
.....	汪伟群 (沪) (5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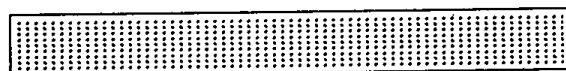
○第七编 农村经济改革与乡镇企业发展

论苏南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兼论独立的联合规律 ...	梁林宝 (苏) (571)
关于乡镇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思考	周长杰 (鲁) (580)
浅谈乡镇企业改革	李锦文 (赣) (587)
对乡镇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与思考	费钧德 (沪) (593)
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对策	王槐月 (赣) (607)
改革开放给五四农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庄国蔚 (沪) (615)

○第八编 流通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体系建设

从郑州期货市场看中国期货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李经谋 (豫)	(625)
中国的改革与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	胡岳征 (沪)	(63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物资流通企业的改革和 发展	黎 群 (鲁)	(642)
粮食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初探	魏剑锋 卫 华 (豫)	(649)
对我国粮食产销问题的基本思考	魏剑锋 卫 华 (豫)	(656)
我国流通领域方向性的重大改革——上海连锁经营发 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王宗南 (沪)	(664)
深化体制改革 调整资产结构 增强机制活力	杨坤祚 (沪)	(674)
以人为本 增强自力 小型商店在夹缝中求生	顾家鼎 (沪)	(683)
漫漫长路 不懈求索——回眸徐纺改革自强之路	屠原纲 (沪)	(687)
“复关”给我国烟草行业带来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赵九来 (豫)	(691)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换经营机制面临的几个问题 ...	赵炳申 (豫)	(698)
后记		(706)

第一编



中国经济改革总论



加速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何 伟

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这一点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不起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难以进行。近二十年来，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改革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在认识上亦有很大提高，对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已基本上摸清楚，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方针和政策，目标是明确的，措施是具体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如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四句话为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台了《公司法》，又提出抓大放小，三改一加强，加速兼并、破产，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对欠债、呆帐、坏帐的处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方面都具备了一套完整的政策和措施。但为什么除了少数国有企业之外，绝大多数企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有的已到了资不抵债，难以为继的地步。100个试点企业、110个试点城市，到目前还没有取得显著成就，一些声称已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并无有多大起色，原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不得不将试点企业再延长一年。一些上市的股份制企业，除了在资本金上得到一些注入外，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亦无大的改观。国有企业原来存在的问题在这些企业仍然不断出现。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许多措施不能落实？其中原因可能很多，而政府职能不能很快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党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性的任务。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第一个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一转变不能到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会受到阻力，遇到许多困难。对经济体制的转变，我认为不能仅仅看作企事业单位的事情，而与政府没有关系，它应该是从上到下，包括各行各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各个领域。小平同志讲改革也是革命，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应包括体制转型。因为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根深蒂固，已经形成一个全社会的体系和制度，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成为固定的工作程序和规范，整个社会按照这一轨迹来运行，管理者对它的操作已驾轻就熟，习惯成自然，如果其中某一环节脱离开这一体系和轨迹单独运行，会认为是违规，所以，经济体制的转变应当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全社会的转变，而不是某一部分，某一局部。如果其中某一部分想离开这一整体单独进行转变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都是隶属于政府各部门，他们都是企业所有者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企业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在政府下达的计划控制下，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和盈亏自负权，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完全在政府控制下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放权让利，企业就无权无利，政府让多少，企业才能有多少。利改税和承包制等

都是这样，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政府是处于主动地位，企业是处于被动地位，怎样改是政府说了算，而不是企业说了算。许多改革不落实、不到位，主要原因不在企业而在政府，即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仍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办法进行管理，致使企业的体制无法转变。如果政府的职能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竞争性企业，应当从政府中分离出去，企业除了向国家照章纳税外，其他一切经济关系都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准绳，即以等价交换为原则，双方都无权向对方采取超经济的索取。即便是国家投资或控股的企业，国家也不能以所有者的身份把企业的利润全部拿走。谁投资谁收利的原则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如果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国家收利也应有限度和标准，不能将企业利润全部拿走，或大部分拿走，否则企业就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如果是股份制企业，国家只能获取红利，不应再有另外的要求。如果是国家的独资企业，国家获取利润最高限额不能超过银行贷款利息，否则企业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国家从企业索取的利润高于银行贷款利息，在金融市场开放的情况下，企业宁肯用银行贷款来偿还国家的投资，也不使用国家的资金，因为代价太高。也就是说，以市场经济提供的客观标准作为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就表明政府的职能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

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正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一步放权让利，这是从国家统负盈亏向市场经济迈开的第一步，对一个把企业看成是完全隶属于政府部门的生产车间，开始考虑企业权力和利益。但是放权让利有一个度的问题，权力大小，利益多少应有一个客观标准，既不是国家说了算，也不是企业说了算。当时是由政府规定的，因而这种作法是很不规范的。改革的第二步是利改税，想通过制定税率，把国家和企业利益分配关系固定下来，使其规范化和制度化。其想法是好的，但不符合实际情况。一是企业利润的多少，不完全由企业经营好坏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以国家的价格政策为转移（因当时价格没有放开），往往是政府的政策决定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对不同企业实行统一税率是不合理的，也是困难的。二是利和税是两个不同范畴，起着不同的作用，将二者合一是不恰当的。改革的第三步是承包制，将每个企业应交的税和利合起来作为一个承包指标，超额部分企业可以提成。承包制的好处，一是承包指标是根据各企业具体情况来定，可避免一刀切。二是承包制有一定激励机制，鼓励企业超额完成承包任务。但承包制也存在着先天不足。一是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一对一的进行讨价还价谈判。根据现实情况确定承包指标，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承包指标就高，潜力就小，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承包指标就低，潜力反而大，往往会出现鞭打快牛和苦乐不均。二是承包制虽然有了激励机制，但缺少约束机制，会诱发企业短期行为。三是承包制的指标缺乏科学依据，多数企业是根据企业历年情况和预计未来，通过谈判来确定的。过去大家都公认首钢的承包制搞得不错，每年向国家上交递增7.2%。那么现在要问，这7.2%科学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不是5%或8%呢？四是承包制指标只与企业经营状况有关，而与企业占用国家的资本多少无关，这就不利于提高资本金的利用率和资源优化配置。承包制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限额应按资本金正常回报率为基数，不是由政府说了算数。

回忆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说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正在由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过渡。但应看到这一过渡非常缓慢，在许多方面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职能，违背市场经济原则，许多行为不规范，用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管理至今也仍然存在，给企业造成很大困难。

首先，在实行承包制的同时，国家在承包指标之外，又向企业征收教育附加费，能源交

通建设费，以及预算调节费。这些费用虽然比重不大，但是承包制之外的一种摊派，有悖于承包制的初衷。何况企业在交纳这些费用之后，并没有享受到服务。如企业交纳了教育附加费，但企业职工子女上学，还需要向地方政府办的学校交赞助费，否则就不能上学。有的企业不得不自己开办中小学，这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国家如果需要向企业增加税赋，应当通过立法，不应由政府某一部门来决定。

其次，国家对企业的资金实行拨改贷，这一改革本来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供给制的无偿使用国家的资金改变为按借贷原则有偿使用国家资金，利用市场机制来加强企业的责任心，这对节约使用资金是有好处的，应当说这是一个进步。但可惜的是国家这一转变并不彻底，是虎头蛇尾，没有贯彻始终，国家在向企业征收利润时，就放弃了市场经济原则。企业从银行贷款进行基建，投产后只获得一份利润，但国家要企业向银行交一份利息，向国家交一份利润。企业向银行交利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向国家交利润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因企业没有用国家一分钱。特别是在国家规定的贷款利息率超过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时，企业向国家和银行交的两份之和，会大大超过企业所得的利润。这对企业负债来说，如同雪上加霜。尤其不合理的是，企业在用自有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所形成的资产仍无偿属于国家所有，企业在交税和利润上完全如同无偿使用国家资金的企业一样，无任何优惠。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不能鼓励企业偿还银行贷款，因为还贷吃亏。另一方面是企业负债越来越重，目前的三角债不能说与这种做法没有关系。企业讲“不贷款等死，贷款找死”，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这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控诉，三角债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无声反抗。

最后，股份制企业国家股要分红的问题，也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股根据股东的同股、同权、同利的原则要求分红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应忘记，国家股在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下并没有上市，股份制企业并没有从中获得溢价收入，它与社会股不一样，在股票上市的问题上国家股没有作到同股、同权、同利，而在分红的问题上要求的同股、同权、同利，就违背了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不符合等价交换，企业认为不合理。他们讲，不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只上交33%的所得税，而实行股份制的企业除了交33%的所得税外，还要交红利。特别在国家股占企业股份70%~80%的情况下，上交数额很大，等于企业交了双份，又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以上这些情况如果在计划经济体制情况下，政府这些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因为所有国有企业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要多少企业都应当给，有些时候国家将企业的折旧基金和部分大修理费用都收走，企业也没有话讲，因为国家会根据计划需要重新分配。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就不能完全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方针政策不能落实的主要原因。

国家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滞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文化束缚。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果企业脱离开主管部门自主经营，这些部门会感到大权旁落，失掉了财权、物权和人权，便以各种借口反对把产权交出来，都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管理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选100个大企业作试点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没有想到在争这100个大企业的试点管理权上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才以三七开而告终。为了配合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原计划出台12个配套文件，但因各部门互相争执和扯皮，使大多数文件没有出台而

流产。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在我国已取得共识。但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却遇到困难，许多管理部门不愿放权，目前还是“五龙治水”，两个方案。这样就不能建立起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妨碍其作用的发挥及保障基金的运用和经营。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计划经济文化。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一种观念和习惯，有些东西是有文字规定的，有些东西已成习惯，它已约定俗成，潜移默化，代代相传，形成一个观念，他们对计划经济一些东西可以容忍和默许，对市场经济的一些东西百般挑剔和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这种思想如果不铲除掉，市场经济的文化很难树立起来，政府的职能就很难转变。

最近有幸到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四小虎顺德去了一趟，时间虽然很短，收获真不少，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未去顺德前，顺德的同志先到我家来邀请，讲明顺德要在北京举办1997年顺德名优品博览会，事先从北京请一些专家和学者去顺德实地参观一下，当北京博览会开幕时，在北京饭店举行研讨会。到我家来的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市党委宣传部伍部长。当时就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不是政府的有关部门，别人是否会说宣传部长不务正业。到顺德去我是带着问题来的，因为前几年对顺德的改革有不少争议，我虽然支持顺德的改革，但结果怎样，还是以眼见为实。

对顺德参观座谈一天半，参观了六个企业如容声、科龙、美的、华宝、万家乐、格兰仕，都是一些高技术名牌大企业，顺德已成为全国家电的基地。顺德是一个县级市，人口一百万，1996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下同）160.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471.1亿元；财政收入21.0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8.3亿元；职工人均工资10364元，农村人均收入4655元；人均储蓄达2.4万元；农村已城市化，初步达到富裕水平。

顺德为什么在短短几年内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改革上取得三大突破。一是工业产权改革突破，所有企业产权已清晰，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企业是完全独立的法人。二是农村改革的突破，用股份制的形式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划片招标承包，使农业经营规模化和产业化。这就解决了家庭承包制所形成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问题，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突破，实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才会取得工农业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1993年，借党政班子换届之机，进行了领导体制和机关机构的改革。建立起“一个决策中心（市委常委会），四位一体（市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体制，市党政班子实行职务交叉，市委决定事情，按各自的职责范围分别落实，做到全局一盘棋，克服互相扯皮、互相牵制的现象。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采取不分党委部门或政府部门，一律按工作性质和职能进行撤并或保留的方式进行机构改革，按照四个原则处理：第一，同类合并。如组织部、人事局、老干局、直属机关党委合并，统称组织部（对外挂人事局牌子）。第二，另起炉灶，并赋予其新的职能。如撤销经委和乡镇企业局，成立工业发展局；撤销农林局、水产畜牧局、绿委办、糖办、饲料办和农业基地公司，成立农业发展局（与农村工作部合署办公）；撤销对外经贸委、财办、口岸办，成立贸易发展局。第三保留强化。对一些部门予以保留或改称，并强化管理。如宣传部（党史办划入宣传部）、劳动局、规划国土局、公安局等。第四，转性分离。把一些政企不分机构分离，把行政职能归口主管部门执行，原部门转为企业或事业单位。如商业局改为商业总公司，为纯企业单位。通过改革，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党政机构从原来的56个减少到29个，机关人员精简了400多人，提高了效率，加强了服务，市场经济环境

进一步优化。通过改革，完全实现了政企分开，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政府摆脱了沉重的商务困扰，转变了职能对经济的管理从直接转向间接，从微观转向宏观，从行政式转向产权式，做到管好所有权，放开经营权，行使宏观调控权，真正成为社会管理者的角色。通过改革，政府完全成为社会管理者。政府没有任何直属企业，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政府造环境，大家来创业，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只是组织、引导、扶持、协调企业发展，不与民争利。

从他们改革的基本思想来看，党政机关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大家围着市场转，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转，党政机构的职能都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宣传部长来组织名优品博览会了。从他们的经验来看，对两个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增添了新的内容。抓物质文明建设不仅仅是物质生产部门的事，搞精神文明建设的部门也应抓物质文明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物质文明建设的部门不仅要抓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抓精神文明建设，否则是一手软一手硬。搞精神文明建设的部门，也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否则也是一手软一手硬。正因为这样顺德不仅物质文明建设搞的好，精神文明建设搞的也好。

由上想到，顺德的改革有它的条件和特点，如果全国所有党政机构能参考顺德的经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大胆的转变政府职能，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前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也许会容易解决了。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个问题

——兼论上海经济改革

● 贺镐圣



贺镐圣，1928年3月出生，建国以后，长期任职上海经济工作部门。1978年下半年起开始参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设计、规划和推进工作，先后任上海市计委经济研究室主任、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现为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主编《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十年》，回顾与总结上海1979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进程、成就和经验教训；主编《中国企业承包实践（上海卷）》，参与撰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等书，10多年来在报刊发表有关经济改革文章近百篇。

一、90年代上海的改革战略

80年代的上海改革，同全国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但出存在某些滞后和不足。改革初期，上海针对原有体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改革步子比较大，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十年来，全国改革的基本走势是先农村后城市，先中小企业后大型企业，先非公有制经济后公有制经济，先中小城市后大城市。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占有较大比重，因此，随着各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相比之下，上海的改革滞后于国内若干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

上海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要求上海加快改革的步伐。1985年2月和1986年10月，经中央批准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和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上海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两个扇面”、“重要基地”和“开路先锋”的作用，提出上海改革“要走在全国的前列”。但是，由于财政包袱的压力和传统体制的束缚等多种原因，上海改革基本上处于跟随全国的部署，不先不后，同步前进，显得稳重有余，创新不足。

90年代是上海经济振兴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走改革、开放、发展三位一体的新路，真正贯彻实施“走在全国前列”的改革战略。

上海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可以有三种战略选择。第一种，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采取加快改革的方针，要求上海在全国改革中充当排头兵，发挥开路先锋作用。上海以积极主动的